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比喻

要换个「俊鸟」进来 新旧动能转换

□ 杨振

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实质意思就是说新旧动能要转换，换个“俊鸟”进来。当然你不能说是先把“老鸟”给扔了，最后“俊鸟”也没招来，那不就成空笼子了？动能转换要衔接得很好。

从字面上看，“腾笼换鸟”指的是腾空笼子，用新鸟替换旧鸟。在经济学语境中，这一表达被用来指代区域的产业更迭和升级。其中，“笼”是对空间载体的形象化表达，“鸟”指的则是特定产业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把新旧动能转换过程比喻为“腾笼换鸟”，将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比喻为“以‘俊鸟’替代‘老鸟’”，强调“不能说是先把‘老鸟’给扔了，最后‘俊鸟’也没招来”，既明确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路径，也诠释了新旧动能转换的辩证关系。

早在2004年，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曾经提出“两只鸟论”：一个是“凤凰涅槃”，另一个就是“腾笼换鸟”，生动形象地凝聚了关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共识。“凤凰涅槃”意

味着摆脱对粗放型增长模式的依赖，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强调的是发展思路的调整。“腾笼换鸟”意味着优化区域产业布局，不仅要引导产业和企业“走出去”，为产业合理化和高度化腾出更多发展空间；也积极创造条件“引进来”，实现产业迭代升级和跨区域合作交流，强调的是发展动力的转换。当前，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我们不能因资源条件约束坐等“鸟去笼空”，而是要主动在“腾笼换鸟”中实现“凤凰涅槃”。

实现“腾笼换鸟”，需要搞清楚“腾什么笼子”以及“换什么鸟”。从投入产出的效率率看，在不同的产业形态中，既有吃得多、产蛋少的“老鸟”，也有吃得少、产蛋多的“俊鸟”；从产业成长的生命周期看，“老鸟”大多是逐步萎缩的夕阳产业，而“俊鸟”主要是生机勃勃的朝阳产业；从产业升级的技术空间看，有些代表传统技术的“老鸟”往往飞得低，代表新兴技术的“俊鸟”有机会飞得更高。随着支撑经济发展的要素资源约束趋紧，“腾笼”才有机会和空间“换鸟”。“腾笼换鸟”，就是要腾出一些“老鸟”占用的各种能源资源消耗，用以培育、引进和支持“俊鸟”发展，实现产业发展做“加法”，能源资源消耗做“减法”，从而顺利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资源优化配置。

以“俊鸟”替代“老鸟”，前提是要准确识别出谁是“老鸟”、谁是“俊鸟”。同一只鸟，不同的人以不同的眼光看，结论不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看，评价也有别。在地方产业腾挪转换中，也面临由谁来评价产业性质这一核心问题。对发达地区来说，有的产业已经是“老鸟”，但对很多迫切需要承接产业转移的欠发达地区来说，它可能恰恰是符合自身条件的“俊鸟”；对同一地区来说，传统技术条件下的某一产业可能是“老鸟”，但有了科技创新支撑的传统产业也可能变成“俊鸟”。因此，“腾笼换鸟”不是人为给产业贴上“老鸟”和“俊鸟”的标签、简单对其进行空间置换，需要进行识别的科学制度准则。

有效识别出“俊鸟”和“老鸟”，也要注意新老鸟的接替时序，辩证处理好新旧动能转换。一方面，要坚持先立后破。各地既要避免在没有“俊鸟”的时候放飞“老鸟”，也要结合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以及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引入“俊鸟”。若不顾本地实际，好高骛远追求产业升级，试图引入难以与本地要素兼容的新产业，盲目追求产业的“统计数据升级”而非“实质内容升级”，最终将导致扔掉了“老鸟”，“俊鸟”也招不来。另一方面，要解决好“俊鸟”进笼后“老鸟”的去向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在“腾笼换鸟”中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离不开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不能将其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要创造条件让“老鸟”也有机会变成“俊鸟”。

积极推动“八个一批”脱贫工程，有易地搬迁、生态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兜底保障等。

在总书记的指导下，延川县脱贫攻坚各项工作有条不紊、环环相扣地开展着。以延川县的特色产业资源禀赋为例，在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后，县委、县政府着眼于把农产品做大做优，培育脱贫支柱产业，进一步拉长了产业链条。按照“塬面苹果、沿黄红枣、川道大棚、沟道养殖”的布局，全力推进产业扶贫项目。比如红枣种植，最开始的时候农民普遍只种木条枣和团枣这两个传统品种，后来引进了新的品种狗头枣等，发现口感更好、更受市场欢迎。相比老品种，狗头枣个头更大，营养价值更好。除了狗头枣外，现在还有骏枣、蛤蟆枣。有的枣农引进技术，开始做红枣酒，大大提高了红枣的效益，增加了收入。此外，还有 的枣农有本事，最初只管理几十亩地，在政府的支持下，现在管理着几千亩的枣园，这就是农场模式、大户模式了。

还有苹果的种植，十几年前延川农民开始种苹果，但怎么种主要靠农民自己琢磨。就像我之前说的，苹果产业幼园多，管理水平低，种出来的果子大小不一，市场上卖不上价。这几年情况开始改变了，在政府和帮扶单位支持下，果农们开始学技术，一年中光开现场会、搞培训就有20多次，果农家家户户都有“土专家”，都有农业技术员。几年来，全县一共新建和改造苹果园8万多亩，品牌就慢慢打出去了，大家现在不光知道陕西有洛川苹果，还有梁家河苹果。

拉长延伸农业产业链条，主要是为了给农民谋利益。如果在农村能挣钱，穷人们也不愿意离开农村。农业并不是延川的弱势产业，但农民赚不了钱，地头几毛钱，终端几块钱，真正的利益在终端，所以，我认为一定要重视农民作为农业发展主体的发展问题。让农村的劳动力愿意留在农村发展，靠的是产业，靠的是把城市大市场 and 农村连接起来的纽带，靠的是经营方式的转变。在脱贫攻坚中，县委、县政府抓住了这个问题的核心，外引内培，做强主体，向前延伸建基地、向后推进后整理，推广入股分红、托管托养等，发展“一村一品、

现代中国的前景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光明

——读〔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

□ 刘馨泽

吉尔伯特·罗兹曼是美国知名的社会学家，长期致力于中国、日本等国家的比较现代化研究，其著作以深入的历史分析和理论建构见长。由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学术著作《中国的现代化》汇集了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一经问世，便成为海外中国现代化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这本书以跨国比较为研究方法，结合历史发展脉络，深入论述了中国现代化事业从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后经历的发展，为读者理解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提供了独到的见解。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独立自主地走现代化道路提供先决条件

罗兹曼写道，“在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社会中，前现代中国在文化上五彩缤纷，其治理的规模和有效性，真可谓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然而，当现代化的各种模式在世界上展现时，中国却未能跨入先行者的行列。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在一开始为什么如此之难？在罗兹曼看来，本土因素和外来因素都产生了影响，因此，探索“特殊的中国背景”是十分迫切的任务。

罗兹曼认为，中国现代化起步缓慢并影响它后来发展的“病根”出现在18世纪。第一，在政治层面，清廷过度强化中央集权控制，抑制了精英分子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导致官僚体系效能衰退；税额冻结与官僚队伍停滞，使政府失去应对人口激增的治理能力。第二，在经济领域，18世纪后未能建立起经济增长的基础，以适应同期人口的增长，官吏肆意干预经济，错失市场结构革新机遇，与同期日本、俄国通过国家干预推动工业化的路径形成鲜明对比。第三，在国际战略方面，清廷将目光集中于亚洲内陆，相对忽视了侵略会来自海疆的可能性，并将外贸限制在官方的密制约之下，错失了发展海洋贸易的机会。第四，在社会整合方面，资源分散于地方未能向城市集中，削弱了中央财政动员能力。第五，在教育文化方面，文字狱等遏制思想创新，既未效仿俄国及时建立科研机构，也未如日本普及基础教育，致使文化优势尽失，文化发展一度陷入停滞。

这些矛盾在19世纪演变为全面危机。鸦片战争撕开海防缺口，列强通过条约体系瓦解主权，白银外流引发经济混乱，人口压力威胁农村稳定。清廷的洋务运动试图嫁接西

方技术却未改革制度根基，陷入“体用分离”困境。戊戌变法至清末新政，始终未触及制度根基。辛亥革命虽终结帝制，但却未能建立一个有力量去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政权。直至中国共产党在对现代化的探索中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中国独立自主地走现代化道路才有了先决条件。

中国共产党使中国走上了一条新路

罗兹曼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夺取全国政权后，开启了国家振兴的历程。他指出，1949年的中国具备有利于现代化的诸多因素。一是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有所改善，具备长期与外国交往的能力；二是中国建立起一个“强大而整齐划一的中央政府”，能动员大量资源来提高国民福利；三是中国所具有的许多经济因素，诸如盛行的市场导向，高度的竞争状况，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灵活使用等，最终都有助于现代化建设的展开；四是中国有着尊重知识的特殊国情，并以科学观改造地方习俗和宗教，因而减少了知识进步的阻力。这些条件，无疑是现代化建设的优势，加快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改造社会的步伐。

在当时社会生产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种种政策，其大部分旨在实现经济增长、军事发展、科学进步，以及实现同属于现代化特征的其他目标。罗兹曼认为，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很显然已经克服了很多障碍；在国际关系中已经完全恢复了主权；强有力的国家指导着各个部门的社会变革，并进一步重新改造社会；重工业迅速得到发展，现代化工业增长的各项必要条件正在得到满足；日趋大规模地动员了城市和农村的资源，他们在很短时期内就能在一个依然相对落后的社会里成功进行高层次的社会整合；受到教育和掌握现代知识的人在数量上迅速增加。罗兹曼还指出，在经济成功增长方面，中国这时已经与日本、俄国19世纪末的水平大体相当。就城市部门的某些特征而言，中国已达到日本、俄国20世纪初的水平。在现代化的跑道上，中国终于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缩短与这两个邻国的距离。“总体上来说，50年代中期是迅速进步的时期”，中国领导人摒弃了苏联和国民党两者的道路，

从外国人著作
看中国

附中，谈合作办学的事。我们想把清华附中的优质教育资源引进革命老区，办一所学校，让老区的孩子也能享受到最高水平的基础教育资源。清华大学非常支持，这件事推进得很顺利，很快就建成了清华附中文安驿学校。学校的教学水平很高，清华附中会派老师来学校交流，我们这里的老师也可以到清华附中学习。这样就让我们革命老区的农村孩子也能上好学，能在广袤的黄土地上体验清华园的优质教育资源，让延川的孩子不出家门就能享受全国高水平优质教育资源。以前，我们延川县每年考上大学的也就百八十人，现在每年几百人，而且上985、211的就有几十人，简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之前设想的目标是延川每年能有5千人上清华北大，现在看来距离这个目标已经非常近了。

还是回到当年总书记来调研的事。开完座谈会第二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延安市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看望教职工。他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时提出开展“千家企业建千校”活动，这所希望小学就是1995年由福州市捐资兴建的。离开学校前，闻讯赶来的群众一起高声向总书记问好。总书记走到他们面前说：“我是延安人，回来看一看，向大家拜年！”群众也一齐大声向总书记拜年，大家都欢声笑语，喜气洋洋的。在浓浓的年味中，我们延川县老百姓满怀信心，踏进了农历新年，一起迎接脱贫攻坚的全新气象。2019年5月，延川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实现整体脱贫“摘帽”。2021年2月，延川县委被党中央、国务院评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2020年5月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谈及往事，他饱含深情地说：“我们这一代人有这样一 个情结，一定要把我们的老百姓特别是我们的农民扶一把，社会主义道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全面小康，大家一起走这条路。”如今，梁家河的乡亲从苹果树上“摘下”小康生活，吃上了“旅游饭”，齐刷刷地过上了甜美的新生活。这几十年，党和国家一直想着我们，各种扶贫帮助就没断过。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领着我们终于把这个事情干成了，革命老区的百姓不受穷了，旧貌换新颜，我想这是对牺牲的先烈们最好的告慰吧。